

新时期敦煌文献研究的奠基人——纪念唐耕耦先生

马 德

唐耕耦先生于2017年11月7日以九十高龄与世长辞。国图刘波同志约我写篇文章以示纪念，我和唐先生接触不多，但他一直是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心目中的大神。虽然他没有那些所谓的大师、泰斗们的赫赫威名，但他的贡献，特别是对敦煌文献研究的巨大贡献，在国内学界还没有哪位大师能和他比肩。因此，作为一名直接受惠于唐先生，长期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后学，我非常愿意写这篇小文，以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

今天在中国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人，上至耄耋之年的前辈，下至初涉学界晚生，没有人不知道，也没有人不阅读和使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这部数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即是唐耕耦先生奉献给敦煌学界的基础入门读物和资料依据。因此，说起唐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著作。2009年，唐先生写了《我的“敦煌学”经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①（以下简称《回忆》），详细介绍了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作为过来人，笔者自然熟悉那个年代人文科学研究和成果出版的艰难，对先生的精神更是万分钦佩！先生一生为人低调，只做不说。《回忆》中的过程尽管很详细，但对其贡献几乎只字未提。为此，笔者在这里首先就自己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的几点认识作些补充

第一，《释录》是唐先生在极其艰难困苦下的敦煌文献整理，是所有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学者中，短时间内阅读敦煌文献最多的学者。

^① 工作单位：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

^② 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唐先生整理释录是在1980年，当时要出国看原件，真比登天还难；而且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清的出版物，主要是在缩微阅读器上看135的单色胶卷。缩微胶卷和阅读器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也很少有人使用；但在三、四十年前还是很先进的阅读工具，特别是唐先生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看胶卷的1980年前后。笔者从1978年到敦煌工作开始，就接触和使用缩微胶卷和阅读器。尽管先进，但用起来十分费劲，阅读器是手摇的，单色图片需要一张一张过目，阅读器上看起来很吃力。如果阅读器出了毛病，就得自己拿着放大镜直接看胶片。王重民先生当年谈到编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时，还专门谈到刘铭恕先生工作的艰辛^①。

从先生的《回忆》中得知，先生从开始到完成《释录》，前后仅1980至1982年三年时间。唐先生接触的敦煌汉文文献应该有50000多件，当时手头的英、法和国图的缩微胶卷加起来长达10000米左右，从头到尾摇上一遍。还要把一般来讲写的都不是很工整，又漫漶不清的社会文书全部抄录下来，满打满算只用了三年时间，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这个工作体现了唐先生广博的知识和坚实的基础。当然，唐先生早在1959年就参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敦煌资料》第一辑的整理，多年来一直关注敦煌研究，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意外。特别是之前国外关于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大量成果，在《释录》中也有比较详细的信息。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施萍婷先生就几次说过：唐先生把整理工作都做完了！那个时候，《释录》筚路蓝缕的奠基之功，让刚刚起步的敦煌文献研究插上了翅膀！新人和成果大量涌现。而《释录》则是敦煌文献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第二，《释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囊括敦煌汉文文书的所有，包括历史地理、军事政治、僧团组织、寺院经济、社邑、契约、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碑铭赞颂、人物传记等包罗万象的社会记录，涵盖了众多学科和专业；所有的初学者都是因为有了《释录》，就可以根据自己研究所长，比较轻松的从中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找到和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尽管先生以极其朴实的语气十分低调地说，《释录》“对于有志于敦煌学而苦于缺乏资料的外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我想还是有用处的。”^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释录》成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敦煌学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科技史家等等；粗略地估算一下，《释录》问世三十年来，至少有上百篇博士论文和数百篇硕士论文，以及数十种著作和千余篇论文都是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虽然这些论文论著中指出过《释录》中不少的识读和校勘失误，

^①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44页。

^②唐耕耦：《我的“敦煌学”经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见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按当时的研究条件，任何人也不能苛求《释录》做到完美；而且尽管的所失误，《释录》仍然是研究者们必备的基础资料。

笔者自己即是多年受益于《释录》：无论是作为关于敦煌石窟、敦煌历史及敦煌工匠的研究的基础资料，还是作为敦煌文献整理的方法手段，三十多年来《释录》一直是我的业师。

第三就是《释录》对唐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因为对敦煌文献有全面系统的掌握，所以做起研究来如蛟龙入海，得心应手；加上当年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人不多，好多问题都没有涉及过。唐先生为天下先，他首先集中在法律和寺院经济方面。他用最快的速度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编写了《敦煌法制文书》^①；接着出版了《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特别是后者，在国内首倡敦煌会计文书，首创敦煌会计学，梳理和确认了敦煌寺院会计四柱结算法，无论是在敦煌研究，还是中国会计史、经济史的研究，都是突破性的重大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们作了坚实的铺垫！

因为掌握丰富的第一手的敦煌资料，加上个人广博的知识和雄厚的基础，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都运用自如，游刃有余。从唐先生发表的论文中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敦煌文献为基础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大到土地制度、兵制徭役，小到粮食品种、物价计算，以及民间社邑团体、契约法规、姓氏郡望、经目抄写等^②，无一不是开研究之先河。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考证也是独具慧眼^③；同时，也是唐先生从敦煌文献中认定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张报纸^④。

唐先生的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都是在国内敦煌研究的起步阶段的成果，限于条件，自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唐先生的成果依然是任何一位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学人必须要读的基础训练。

二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方法实际上就只有三种：生活、生意和事业。

^①《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②参见本书所收《唐耕耦先生著述要目》，兹不一一列举。

^③《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④《邸报：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八小时以外》，1980年第1期。

在维持生存的前提下，从衣食住行、学习教育到生儿育女，人们的生活方式各有不同，这是谁也躲不开的。生活之外，无论任何事情也就只有事业、生意两种做法。当生意做，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名为了利；当然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为名利而奔波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做好了，生意也可以变成事业。而一开始就以事业为重的人，就不会计较个人名利，只是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唐先生就是在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境遇下一心一意做事业的人。从我与唐先生为数不多接触的几次短暂的接触中，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和众多老一辈专家学者一样，唐先生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首先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唐先生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2016年7月在先生家中拜访时，看到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普通学者家中的情景：简陋的旧楼房两居斗室，可能还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吧？没有任何装修；除了书架、书桌和一张单人的硬板床，一台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电风扇，家里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如果不是当时已经把绝大部分的书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满屋的书籍会让来访的客人无立足之地。30年间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生活有了很大提高，而唐先生依然还是甘守清贫，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耄耋之年还笔耕不辍。

其次，对老一辈学者专家的尊崇，对有过帮助的同行，甚至青年学者们的启发，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先生在《回忆》中多次提到前辈学者的提携之恩与同行们的帮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唐先生晚年发表的纪念王永兴先生的文章^①，是其治学经历和体会的真情流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什么都可以过去，留下来的只有人心和人情。当然，人无完人，尊崇前辈、长者并不等于迷信他们；特别是学术研究，任何人，包括最权威的泰斗大师们，都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尽善尽美，我们崇敬的许多老前辈也是如此。他们的奠基功勋和启迪作用永远彪炳青史，但总会留下一些有待商榷和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唐先生纪念王永兴先生的文章对这一点也毫不避讳，在纪念前辈专家和师长的同时，对他们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结论有不同看法，也会提出中肯的意见，开拓自己和其他后学新的研究思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是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也是必经之路。

再次，对学术界和学术成果的全方位的密切关注也是，特别是对一代接一代的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的成果，都是过目不忘。正如他自己在《回忆》中所说：“中国敦煌学在一代

^① 《纪念王永兴先生》，载《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

一代继承下去，要老中青三结合，而以年富力壮、学有根底的为骨干来挑大梁，为项目主持人。只有大批的中青年学者为学术带着人成为主流，敦煌学才算兴盛发达。”^①记得在本世纪初一次北京举行的一次敦煌学术会议的间隙，我特别受到唐先生的赞扬和鼓励，得知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年轻一代敦煌学人的成长。当时我正值盛年，看得出，先生虽然离我比较远，平时又很少联系，但他一直关注我和所有从事敦煌研究的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们。有老辈专家们的关注，这是我们的荣幸。但遗憾的是我们缺少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让我们的工作可能会走不少弯路。中国有句古语：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对年青的学子们来讲，能有机会经常当面听到老辈专家的教导，会让自己的研究工作突飞猛进，同时也让老前辈们少些遗憾。我想这也是我们纪念唐先生和其他学界先辈们的时候都会有的感受。

和很多从事敦煌研究的老前辈们一样，唐先生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及其奉献精神，他不仅教我们做学问，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我们如何做人，其道德文章堪为后世典范。

（2018年5月1日于兰州）

^①《我的“敦煌学”经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见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第15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